



第一節 《遐邇貫珍》：不“純”的起點

有關於香港文學的起點，文學史最早追溯到 1874 年王韜創辦的《循環日報》。其實還可以往前追溯，那就是 1853 年創刊的《遐邇貫珍》。作為香港第一份中文期刊，《遐邇貫珍》深具歷史價值。《遐邇貫珍》由馬禮遜教育會創辦，先後由傳教士麥都思（W.H. Medhurst）、奚禮爾（C.B. Hillier）和理雅各（J. Legge）三個人編輯。《遐邇貫珍》本身篇幅不大，少至二三篇，多至七八篇。刊物每期都有一個固定的“近日雜報”新聞欄目，其他的有雜論、遊記、翻譯等。它雖具傳教性質，卻已經大體上是一份現代意義上的報刊。

《遐邇貫珍》第 1 期有一篇“序言”，估計出自麥都思之手。“序言”開始介紹了中國之地大物博，古代文明遠遠領先於異邦，然而在近代以來落後了，被歐美所超越。落後的重要原因是封閉。文章談到，中國一向沒有報刊，“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折，僅得朝廷舉動大略外，向無日報之類”。他們希望以《遐邇貫珍》為先行，引導中國現代報刊，“其內有列邦之善端，可以述之於中土，而中國之美行，亦可以達之於我邦”。

近代傳教士在中國辦的第一份期刊，是 1815 年馬禮遜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的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》。此後，倫敦傳道會又創辦了《特選撮要每月紀傳》（1823 年，巴達維亞）和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（1833 年，廣州—新加坡）。在鴉片戰爭之前，倫敦傳道會已經在南洋擁有了馬六甲、新加坡及巴達維亞三處印刷廠。這些報刊主要是為了宣傳宗教，不過非宗教的篇幅逐漸增加。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》是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，初期在廣州，後來移到新加坡。它的宗教內容已經少了很多，可以說是一份世俗刊物了。《遐邇貫珍》是接此脈絡而來的，它涉及的範圍更廣。《地形論》（1853 年第 2 號）、《慧星說》（1853 年第 3 號）和《地質略說》（1854 年第 3、4 號）等文涉及的是地理、地質、



天文等，《極西開荒建治析國源流》（1853 年第 4 號）、《花旗國政治制度》（1854 年第 2 號）和《英國國史總略》（1855 年第 9 期）等文涉及的是英美歷史知識和政治制度，《火船機制述略》（1853 年第 2 號）、《生物總論》（1854 年 11 號）和《熱氣之理總論》（1855 年第 8 號）等文介紹機器、生物和物理等方面的知識，《佛國烈女若晏記略》（1855 年第 5 號）、《西國詩人語錄一則》（1854 年第 9 號）等文牽涉到西方文化、文學的方面。從地理、歷史到科學、政法等，傳教士試圖通過《遐邇貫珍》重組中國人的心智，他們既有傳教和殖民的動機，文章也有現代知識傳播的效果。

《遐邇貫珍》上其實有不少中國人寫的文章，據日本學者考證，《西國通商溯源》、《粵省公司原始》等文可能出自王韜之手，《英國國史總略》、《續英國國史總略》可能出自蔣劍人之手，法國聖女貞德的傳記《佛國烈女若晏紀略》和《馬可頓流西西羅紀略》應該是蔣劍人與艾約瑟共同撰寫的介紹西方文學文章的一部分。《景教流行中國碑大耀森文日即禮拜考》則標明了作者為中國科學家李善蘭。

對於香港文學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幾篇遊記散文。《遐邇貫珍》的文章不署作者，在中文目錄上和文章裏都看不到作者的名字，這是人們無法確定作者及其國籍的原因所在。然而，在英文目錄中，這幾篇遊記散文卻都被標明是“Communicated by a Chinese”，因而可以確定這幾篇遊記散文的作者是中國人。這幾篇遊記散文分別是《琉球雜記述略》（1854 年第 6 號）、《瀛海筆記》、《瀛海再筆》（1854 年第 7、8 號）、《日本日記》、《續日本日記》和《續日本日記終》（1854 年第 11 號、12 號，1855 年第 1 號）。這幾篇散文所佔刊物的篇幅都頗為不小，第 6、7、8 號的《遐邇貫珍》，除了新聞和伊索寓言翻譯這兩個固定欄目外，全刊都只有《琉球述略》、《瀛海筆記》及《瀛海再筆》一篇文章，成為這一期刊物的主體，《日本日記》更是連載了三期，可見《遐



《遐邇貫珍》1



《遐邇貫珍》2



第一章
香港文學起源

邇貫珍》對於這幾篇散文的重視。從題目可知，《琉球雜記述略》是琉球遊記，《日本日記》是日本遊記，《瀛海筆記》在題目上未提供國名，實乃英國遊記。據考證，《琉球雜記述略》的作者可能是錢蓮溪，他是與傳教士有密切關係的人。《日本日記》的作者是廣東商人羅森，1854 年他隨美國艦隊訪日，寫下了近代中國人訪日的最早的文字之一。《瀛海筆記》的作者是燕雨耕，此文是他於咸豐初年隨英駐京公使威妥瑪（Thomas F. Wade）去英遊覽的結果。這幾篇散文在文字上有時頗具文采，如《瀛海筆記》開頭是：“友人云，壬子二月初，由香港附西國海舶，揚帆登程，向西南駛行。二三日猶隱約見山，海水深藍如靛，十餘日則浩渺無邊，汪洋空闊，不見涯岸島嶼，惟飛鳥黑白成群，翱翔覓食，或飛魚鼓翅舞躍，亦時隨舟中，為人所捕。”可以說，它們既有思想價值也有文學價值。

《遐邇貫珍》安排這幾篇中國人的文章，應該說有其用意，旨在通過中國人的現身說法，提供中西差異的說明。正如筆者在《小說香港：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》一書中所分析的，《遐邇貫珍》本身的敘述策略即是褒揚英國而貶低中國，建構香港的殖民認同¹。

不過，接觸西方的近代中國的知識者，已經不再可能是單一主體²。中國作者可能受到傳教士的影響，但敘述主體既已翻轉，其中的含義即可能產生了變化，東方主義轉成了主動向西方學

1 趙稀方：《小說香港：香港的文化身份與城市觀照》〔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8〕，31-33 頁。

2 Homi K. Bhabha, “Interrogating Identity - Frantz Fanon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rogative”, in *The Location of Culture*, (London: Routledge, 1994), p. 52. 另參見 Arif Dirlik, “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s of Orientalism”, in *The Postcolonial Aura: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*, (Boulder, Colo.: Westview Press, 1997), pp. 114, 118.

習。王韜在《瀛海筆記》的開頭，即將其與魏源的《海國圖志》和徐繼畲的《瀛環志略》相提並論。

作為鴉片戰爭以後第一份可以自由流通和閱讀的刊物，《遐邇貫珍》在當時廣有影響，銷售除香港外，還有廣州、上海等地區。據 1856 年第 5 號終刊號《遐邇貫珍告止序》：“《遐邇貫珍》一書，自刊行以來，將及三載，每月刊刷三千本，遠行各省，故上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，下遞工商士庶，靡不樂於披覽。”如此一份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刊物，出自於香港，足見香港在近代以來西學東漸中的前沿位置，而中西文化的混合性也說明香港文學的後殖民特徵。

第二節 《循環日報》：王韜與副刊問題

香港的中文報紙，開始是由西報附帶出版的。創刊於 1857 年的《香港船頭貨價紙》，是《孖刺報》出的中文報，後更名為《香港中外新報》，是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。1871 年，《德臣西報》出版中文報《中外新聞七日報》，它是《華字日報》的前身。早期中文報紙雖由華人主持，不過不得不依附於西人，內容上主要是商業信息及新聞。

香港第一份由中國人創辦的報紙，是 1874 年由王韜參與創辦並任主筆的《循環日報》。《循環日報》強調“本局介設《循環日報》，所有資本及局內一切事務皆我華人操權，非別處新聞紙館可比。是以特延才優學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。凡時務之利弊、中外之機宜，皆得縱談無所抵制”。看得出來，《循環日報》很強調華人對於話語權的控制，它還專門提到了由西人開設的香港華文報紙在言論上的局限，“然主筆之士雖係華人，而開設新聞館者仍係西士，其措詞命意難免逕庭”。《循環日報》首次由華人掌辦，發出自己的聲音，的確意義重大。



首次提出將《循環日報》作為香港文學起點的，是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。劉以鬯在《今天》1995 年第 1 期（總第 28 期）“香港文化專輯”上發表《香港文學的起點》一文，提出香港文學的起點應在 1874 年《循環日報》的創刊，他的全部根據就來自於忻平的《王韜評傳》中的下面一段話：

……他（王韜——引者注）又創《循環日報》副刊，“增幅為莊、諧兩部”。所謂“莊部”，即“新聞、經濟行情”；“諧部”即今日之副刊。王韜以他獨特的文筆，在《循環日報》副刊上發表不少詩詞、散文，各種文藝小說與粵謳。這些文字對促進香港文壇和報界的活躍作用甚大。王韜的各類文學作品，以後也被文學史研究者收入各類書籍之中，成為近代文學史上的一份寶貴遺產。

不幸的是，這段史料出了問題。據查閱，上面這段話來自於忻平《王韜評傳》的 153 頁，不過，在這本書註釋中，忻平說明自己並未見到《循環日報》³，所謂創建副刊、“增幅為莊、諧兩部”等話來自於戈公振的《中國報業史》。再查閱戈公振的《中國報業史》，發現忻平過於粗心大意了。戈公振的原文是：“光緒三十年，增加篇幅，分為莊諧二部，附以歌謠曲本，字句加圈點，閱者一目瞭然。”⁴忻平居然漏掉了“光緒三十年”這個時間點，也就是說，戈公振所說的《循環日報》創立副刊時在 1904 年，而王韜在 1884 年就離開香港，1897 年就去世了。忻平所謂王韜創

3 忻平說明：“由於年代較早，《循環日報》國內已無存。”注曰：“本人為此曾多次去信國內報刊史專家、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方漢奇教授求教。1985 年方漢奇先生函稱：他已尋覓多年，然而全國各大圖書館均無見。”忻平：《王韜評傳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0），120 頁。

4 戈公振：《中國報業史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1955 年 3 月第 1 版，1956 年第 2 次印刷），20 頁。

辦副刊的說法，完全就是一個史料錯漏。

《循環日報》國內不藏，香港大學也只藏有部分微縮膠卷，所藏最全者為大英圖書館。筆者查閱過大英圖書館的《循環日報》微縮膠卷，也查閱過香港大學的微縮膠卷，並沒有看到《循環日報》在創刊時有副刊。《循環日報》的版面是固定的，一共四版，第1版和第4版全部是商業行情和廣告，第2版是新聞，第3版部分是新聞，包括有“中外新聞”、“羊城新聞”和“京報全錄”幾個部分。王韜的文章置於新聞版面內，基本上是政論雜文，沒看到有文藝作品，更沒有專門副刊。劉以鬯本非學者，錯引一段資料屬於正常，不過，由於他在文壇的地位，這一觀點流傳甚廣，香港文學史都採用了他的說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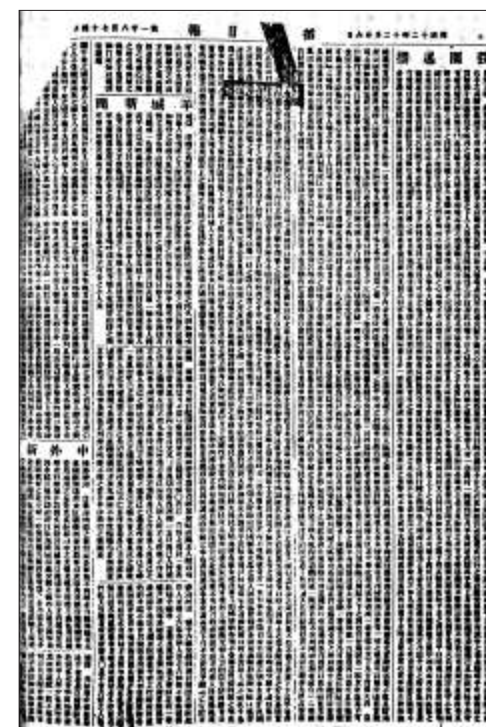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知道，王韜在香港期間有大量寫作，的確堪稱香港文學開山。王韜正式來港的時間是1862年，離開的時間是1884年，《循環日報》創刊於1874年，是王韜在港中期所創，而他在《循環日報》之前就有大量創作，前面我們已經提到，他早在《遐邇貫珍》上就發表文章。

王韜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最大貢獻，是他的報章體政論文章。由於王韜較多接觸西學，並曾出訪歐洲日本等地，具有開放的眼光。他撰寫了大量的有關於政治、經濟、外交、軍事、人才諸方面的文章，介紹西學，並發表了自己對於中國變革的見解，這對於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。從文學上看，這些報章體文章創造了一種散文新文體，對於後來梁啟超等人的散文文體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
需要強調的是，王韜作為一個中西文化“協商者”的角色。王韜出生詩書之家，18歲考取秀才，不過因為家庭變故，應傳教士麥都思所邀去上海的墨海書館工作，大量接觸到西方文化，並加入基督教會。王韜的思想雖受傳教士影響，然而中國傳統文化仍是他的思想根基。前期王韜協助傳教士翻譯整理《聖經》及中



《循環日報》1



《循環日報》2

國文化典籍時，主要是依附性的，而在他獨立主編《循環日報》時，則已經具備了獨立的思想。

第三節 《中外小說林》：新的發現

20 世紀初，為逃避清政府的迫害，孫中山等人以香港作為革命活動的大本營。為了進行宣傳，革命黨人在香港進行了大量的文化活動。同盟會機關報《中國日報》於 1900 年創立於香港，並在香港維持了 12 年，影響甚巨。除《中國日報》，革命黨人還在香港創辦了十多份報紙。

據阿英《晚清文藝報刊述略》，香港文學最早的文藝期刊，是 1907 年的《小說世界》和《新小說叢》兩種。關於《小說世界》，史家多以“失存”而不談。事實上，我們還可以找到一點線索，了解此刊的大致內容。

阿英本人並未見到《小說世界》這個刊物，僅見到第 4 期的目錄。據阿英回憶：1955 年 10 月，汕頭梁心如先生寫信告訴阿英，他訪求到香港出版的《小說世界》第 4 期 1 冊。根據廣告，知道《小說世界》是旬刊，逢五出版。第 4 期是光緒丁未（1907）年 2 月印行，阿英由此推定，創刊期應該是在 1907 年 1 月。梁心如給阿英附寄了《小說世界》第 4 期的目錄：

[社說]

續論中國小說之源流體例及其在文學史上之位置（瑛珀）

[小說]

春蝶夢（第四回，冶公）

教習現形記（第四回，覺公）

失女奇案（第四回，啟明）

復仇槍（第二回，復魂女士）



第一章
香港文學起源

愛河潮（第一回，原名“偵探毒”）

神州血（第五回，亡國遺民）

美人首（第五回，抱香譯）

秘密蹤跡（短篇，焦桐主人）

[戲曲]

圖南傳奇（第五出，鶴唳）

救國女兒（班本，第四出，虯俠）

[傳記]

大小說批評家金聖歎先生傳（廖燕）

“復仇槍”的回目是：“開書肆輸入文明；入學堂提倡教育”。梁心如注云：“述徐錫麟、秋瑾事。不過書裏的秋瑾，則另名為姓崔名秀懇。這一回述錫麟、秋瑾興辦男女學校經過”。“神州血”回目是：“翻逆案馬賊臣弄權，復中原史閣部出師”。注云：“述明末史可法、阮大鍼事”。“圖南傳奇”第五出“修書”，注云：“譜一志士黃虯龍，因遭庚子八國聯軍之役，流亡海外爪哇、檳榔嶼一帶，被眾推為民主首領。因感中原多事，神州陸沉，無聲呼籲訴，有淚感瓜分，贊有志欲圖中原。但思帳下無人參贊軍機，乃修書一封，命斥堠長一劍生往中原，約其中表自由女士，前來共舉大事”。“救國女兒”回目是“奇女子誓身救國，慈父母力主從軍”。注云：“譜法國愛國女兒惹安事”。據說，全冊“多為反帝、反清作品”。小說所載詩詞，“並非吟風弄月，無病呻吟，而多為鼓吹民族獨立意識者”。⁵從“反帝反清”、“鼓吹民族獨立意識”云云來說，很明顯，《小說世界》是孫中山革命黨人在香港創辦的鼓吹民族革命的刊物。

《新小說叢》創刊於清光緒三十三年（1907）十二月，所存也

5 阿英：《阿英全集》第 6 卷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3），259-260 頁。



很少，阿英僅得三期，筆者也看到了全部三期。刊載於第1期的連載小說有：邱菽園的歷史小說《兩歲星》、（法）朱保高比的俠情小說《八奶秘錄》、英國婦孺小說《亡羊歸牧》、文楷的家庭小說《破堡怪》、（英）彌士畢的《奇緣》、（英）女士亞利美都著驚奇小說《血刀緣》、（英）屈敦的艷情小說《奇藍珠》和（法）賈波老的《情天孽障》。除了邱菽園的歷史小說《兩歲星》之外，全部是翻譯小說。第2期增加了未註明作者國籍的翻譯小說《破堡怪》、《波蘭公主》、《盜屍》和《女奸細》。第3期主要是上述小說的續登，增加了未註明作者國籍的翻譯小說《噩夢》，又多了一個“叢錄”：包括樹珊譯的《廣聞略譯》、星如輯的《歐美小說家傳略》等內容。由此看，《新小說叢》主要是一個以翻譯為主的通俗文學刊物。阿英斷言，“事實上，《新小說叢》仍是以偵探小說為主的刊物”。從“歷史小說”、“俠情小說”、“婦孺小說”、“家庭小說”、“驚奇小說”和“艷情小說”等名稱看，《新小說叢》應該不止於偵探小說，而是與其他晚清文學期刊差不多，名目繁多。據阿英，林文聰《祝詞》、黃恩煦《序》和LSL《英文序》三文的旨義不外闡明：“小說之作，體兼雅俗，義統正變，意存規戒，筆有褒貶，所以變國俗，變民智莫善於此。”而其內容，阿英概括為：“蓋有激於晚清內政之腐，外交之失而有言也。”⁶

需要指出的是，阿英掌握的資料並不全，現存最早的香港文藝期刊其實並非《新小說叢》，而是阿英《晚清文藝報刊述略》沒有提到的《中外小說林》。《中外小說林》前身是創刊於1906年8月29日的《粵東小說林》，次年即1907年5月1日遷移到香港出版，易名為《中外小說林》。1908年1月由公理堂接手，刊名又改為《繪圖中外小說林》。2000年4月，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出版了《中外小說林》影印本，其中包括《粵東小說林》

第3、7、8期，《中外小說林》第5、6、9、11、12、15、17、18期，《繪圖中外小說林》第1至8期及第11期，共計20期，時間之早，數量之豐富，都遠遠超過了《新小說叢》。

《中外小說林》（以下統稱為《中外小說林》）的創辦者，是黃世仲（小配）和他的哥哥黃伯耀兩人。時黃世仲擔任同盟會香港分會的工作，係《中國時報》的編輯。除《中外小說林》外，他還參與創辦了《少年報》、《社會公報》、《廣東白話報》及《有所謂報》等報刊。《中外小說林》係革命派的文藝報刊，目的在於用文藝形式動員民眾，鼓吹革命。刊登於《中外小說林》第1期的《小說林之趣旨》有云：“處二十世紀時代，文野過渡，其足以喚醒國魂，開通民智，誠莫小說若。本社同志，深知其理，爰擬各展所長，分門擔任，組織此《小說林》，冀得登報界之舞台，稍盡啟迪國民之義務。詞旨以覺迷自認，諧論諷時，務令普通社會，均能領略歡迎，為文明之先導。此《小說林》開宗明義之趣旨也。有志之士，盍手一編。”

《中外小說林》的結構大體分為三個部分：首要是“外書”，其次是主要部分小說欄，再其次是港粵本地通俗文藝部分。“外書”即論說的部分，《中外小說林》的“外書”主要是文學論說，如《文風之變遷與小說將來之位置》（第6期）、《中國小說家向多托鬼神最阻人群慧力之進步》（第9期）、《小說之功用比報紙之影響更為普及》（第11期）、《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》（第12期）、《小說之支配於世界上純以情理之真趣為觀感》（第15期）和《淫詞惑世與艷情感人之界線》（第17期）等。看得出來，這些文章繼承了梁啟超的小說啟蒙的思路，不過在目標上更進一步將“改良”變成了革命。《中外小說林》的小說欄，分為創作小說和翻譯小說兩部分。創作小說部分，黃世仲本人的“近世小說”《宦海潮》和《黃梁夢》一直連載，佔據了主要部分。翻譯小說部分也分為“偵探小說”、“艷情小說”

⁶ 阿英：《阿英全集》（第6卷），267頁。



《新小說叢》



《中外小說林》1



《中外小說林》2



《中外小說林》3



第一章
香港文學起源

等，篇幅也頗不小。通俗文藝部分包括種種港粵地方曲藝形式，如“南音”、“班本”和“粵謳”等等。

《中外小說林》所奉行的，是典型的中國民族革命敘事。黃世仲以民族主義為核心思想，號召推翻晚清王朝。作為一個在香港生存的刊物，這裏不免有幾處弔詭乃至悖論的地方。第一，《中外小說林》主要以內地革命為關懷，只是把香港作為一個革命陣地，香港本身並沒有獲得自主地位。第二，更有意味的是，黃世仲等革命黨人的民族主義只是針對滿清王朝，對於香港本地的殖民主義卻並不注意；非但不注意，黃世仲，包括孫中山在內，都對香港的治理頗有好印象，並將其視為內地革命的榜樣。這說明殖民性和現代性一體兩面的特徵，也說明香港文化身份的複雜性。

可惜的是，由於《中外小說林》發現較晚，後人數沒有注意到這個刊物。劉以鬯在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·序》中談到香港早期刊物的時候，提到《小說世界》、《新小說叢》，然後直接就跳到了《雙聲》和《英華青年》⁷，《中外小說林》中的小說自然無緣得選。內地的香港文學史研究，雖然提到孫中山革命黨的文化活動，卻也遺漏了《中外小說林》。

第四節 《英華青年》：“五四”新解

在晚清和辛亥時期，香港都站在了中國歷史的最前沿。在“五四”政治愛國運動中，香港同樣積極響應。1919年“五四”運動發生後，消息迅速傳到香港，香港的《華字日報》等報刊開始大篇幅報道。5月中下旬，香港出現市民抵制日貨的反日活

7 劉以鬯：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·序》〔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6〕。



動，他們在街上張貼罷用日貨的傳單，還有學生手持“國貨”雨傘遊行。據陳君葆回憶，香港大學也出現了學生請願活動，被校方勸阻，但他們仍然以“香港中國學生”的名義發了電文。⁸

近年來新發現的文藝期刊《英華青年》，讓我們看到了“五四”在香港的反響及其文學表現。由香港英華書院創辦的《英華青年》有前後兩種，都僅存第1期。前一種創刊於1919年7月1日，後一種復刊於1924年7月1日。1924年第1期的《英華青年》，刊登了一篇鄧傑超所作的小說《父親之賜》。小說的主人公是“五四”時期一個賣國賊的兒子，從行文看，這個賣國賊應該是曹汝霖、陸宗輿和章宗祥三個人中間的一個。小說由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構成，他為父親的賣國行為感到羞恥：“父親呀！你同你那幾個雞朋狗友，狼狽為奸的，把錦繡山河的祖國送到那裏去啦？你們三個人，擁着那三千萬元賣國的代價，腳底明白，溜之大吉的逃往歐洲去逍遙自在，卻不見你祖國大好江山已變成外人的領土，四萬萬華胄降為皂隸，不知道你在那逍遙自得的時候，可想到你親愛的同胞正是在上天無路、落地無門的時期。”主人公悲痛不已，最後代父親向國人謝罪，把刺刀扎進了自己的胸膛。小說最後刊載了“傑超按”：“為‘五四’風潮痛恨曹陸章三人賣國而作，今登在本校季刊上。”這種直接表現“五四”的愛國小說，即在“五四”時期內地的新文學中，也不多見。

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新文化運動上香港卻並沒有響應內地，而是呼籲新舊兼容，融合中西。《英華青年》初創於1919年7月1日，正是“五四”運動剛剛發生不久的時候。由周夏明撰寫的《英華青年·發刊詞》在談到本刊宗旨的時候說：“溯自歐風美雨，飄灑東亞，新舊思潮，澎湃蕩漾，思互相融合，以成一

種文明偉大之學問。”1924年7月1日重刊的《英華青年》，“發刊詞”由潘顧西撰寫，文中在談到徵稿範圍的時候說：“即讀書之所得，感時之所書，學校之所研求，師友之所講肄，抒性感懷之什，聯吟唱和之辭，無論白話文言，詩詞論說，蒐羅編輯，滿目琳琅……”。從兩篇“發刊詞”中，我們都可以看到，《英華青年》主旨並非在於學習西方文化，批判中國傳統，而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，融合新舊東西，以成一種“文明偉大之學問”。

重刊《英華青年》的第一篇“社論”，是由沈錫瑚撰寫的《對於本志的希望》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我們能夠較為清晰地看到香港《英華青年》與內地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。作者在談論對於雜誌的希望時，首先提到“整理中國文化”，認為“我們中國四千多年光明燦爛的文化，對於身心的修養，人我的界限，均有極嚴密的討論，極深刻的研究。我們倘能拾其一小部分作為立身處世的基礎，辦事的精神，則為聖賢，為豪傑，為中國的救主，固易如反掌，推而廣之，為世界的救星也非難事”。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到，作者強調倡導中國文化的原因，是針對港人崇洋媚外的風氣。作者批評部分港人“醉心於物質的文明，賤視祖國的文化”，“生不願封萬戶侯，但願一當洋行工”，在這種情形下，“我固然很為各同學惜，但也極為我國前途危！所以我希望本雜誌極力整理中國文化，作為中流之砥柱，挽既倒之狂瀾”。文章也提出反對“奴隸式”，然而它不是指所謂“封建”奴隸，而指“媚外式”的奴隸，“社會上時有譏誚本港的學生是‘奴隸’式、‘媚外式’……的學生。這樣羞辱我們，凡有血氣，誰不痛心疾首？試問我們難道不是中國學生嗎？他們為什麼羞辱我們到這樣田地”？

在內地反對舊文化的時候，香港反倒借機召集大陸舊文人，促進香港中國文化的保存延續。內地文人聚集較多的刊物，是羅

8 謝榮滾主編：《陳君葆文集》〔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8〕，384頁。



《英華青年》“發刊詞”上的“無論白話文言，詩詞論說”，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時期香港報刊的態度。香港並不刻意區分文言白話，它們都是中文文學。很明顯，香港所處的歷史語境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。簡言之，中國內地面對的是“封建統治”，所以



《文學研究錄》

需要文化革命；香港面對的則是“殖民統治”，所以需要維護中國文化。作為一場政治運動的“五四”，是以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為主題的，就此而言，香港在文化上的反殖民反倒是延續了“五四”主題的。內地的香港文學史研究沿用中國現代文學的新舊對立結構，將“五四”時期香港的文言文文學視為封建殘餘，顯然是一種誤解。

